

人格结构的行为归类假设与 中国人人格的文化意义

王登峰¹, 崔红²

(1. 北京大学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2. 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心理科, 北京 100853)

[摘要] 根据对中西方人格概念的词源和内涵的分析, 人格内容可划分为四个不同层次, 包括个体的外显行为、内心体验、动机和神经生理基础等四个方面, 不同层次之间存在密切的交互关系; 文化对人格的不同内容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由于对行为含义观察角度的不同造成了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差异, 人格结构的特点也是对文化意义的直接反映。以后的研究应关注文化对人格、行为和适应之间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 人格; 动机; 行为归类假设; 适应

[中图分类号] D9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942X(2006)01 - 0026 - 09

一、人格的内涵与层次

“人格”作为心理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 迄今为止尚没有一种公认的定义。不同理论家对“人格”的界定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但都把“人格”看作是个体外在行为的一致性或稳定性, 是人们在适应环境过程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一种稳定的行为模式或个人特点; 或把“人格”界定为个体的内部整体性, 即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逐渐形成的内心世界的组织与结构。实际上, 西方心理学家对“人格”的定义基本上来自拉丁文“*persona*”, 即面具的含义, 包括表现在外的行为特点和蕴涵于内部而外人无法直接观察的特点两部分^{[1][2]}。例如, Funder^[3]认为, “人格”是“个体思维、情感和行为的特异性模式, 以及在这些模式之下能够或不能够被观察到的心理机制”。Allport^[4]把“人格”定义为个人内在的动力组织, 它决定一个人对环境的独特适应, Pervin^[5]把“人格”定义为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复杂组织, 它赋予个人生活的倾向和模式, 都体现了人格概念的“内在一外在”特点的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同样认为个体的人格是别人无法观测的内在特点和外在特点的综合品质, 只是在不同情况下对内部和外部特点的重视程度不同而已。

按照中西方学者对人格的定义, 研究者^[6]把人格的内涵从内在或外在特点以及能否被观察的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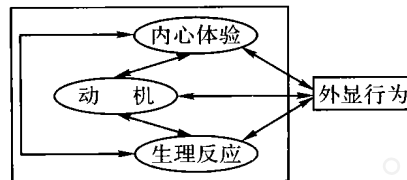
[收稿日期] 2005 - 07 - 08

[本刊网址 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项目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30270469)

[作者简介] 1. 王登峰(1965 -), 男, 山东安丘人, 北京大学心理系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 2. 崔红(1961 -), 女, 山西襄樊人, 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心理科副主任医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人格与临床心理学研究。

度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如图1所示。第一个层次是个体自己和他人都可以观察到的外显行为;第二个层次是个体在做出某种行为时伴随的内心情感和体验,当事人自己能够观察,其他人则难以观察;第三个层次是在个体行为和内心体验背后的稳定的目的性和导向性,反映的是个体对待自己、他人、事业、名誉和利益的稳定的动机,这部分内容当事人也很难完全了解,而其他人则无法观察;第四个层次是个体生理、生化反应模式和神经系统活动的变化,即不同人格特点的个体其基础的生理、生化反应和神经系统活动变化的不同模式,这部分内容无论当事人自己还是其他人都无法觉察或观察。



人格的内部成分——人格的外显成分
第二层次: 内心体验 第一层次: 外显行为
第三层次: 动机
第四层次: 生理反应

图1 人格内涵的四个层次示意图

二、人格结构研究的词汇学途径

人格心理学中的几种主要理论(如精神分析、人本主义等)对人格结构的划分主要来源于理论家的个人经验和对人类特点的领悟,因此,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主观性^[7]。而 Allport 认为,对整个文化中所积累的关于人格特点的知识、经验、领悟和智慧进行分析,应能发现人格结构的特点^{[7][8]}。西方人格的五因素模型及中国人人格的七因素模型都依据人格研究的词汇学假设,采用相似的步骤建立起来的。即首先系统地收集字典和其他来源中用于描述人格特点的形容词并进行初步的分类^{[7][9]},将词表化简并抽取无偏样本,由被试对每一个形容词能够描述自己或他人的程度进行评定,再经因素分析确定人格结构^{[10][11][12][13]}。

人格的四个层次的内容最终都会在行为层面进行表达,而探索人格结构的素材也正是个体的行为表现以及对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内心体验的“推测”和把握。西方人格心理学中的大五因素模型(Five Factor Model, FFM)^{[10][11]}的建立,中国人人格七因素模型^{[12][13]}的建立,以及意大利^[14]和菲律宾人格^{[15][16]}都是依据人格研究的词汇学假设^[8],其核心就是与人格特点有关的行为间的联系模式能够反映人格结构的模式。

采用词汇学途径探索的人格结构有着几个重要的特点。首先,在系统收集所有人格特点的基础上,采用归纳的方法探索人格特点的维度,保证了不会遗漏任何人格维度。其次是描述性,即人格维度的命名是根据每一个维度所包含的项目进行的,而这些项目均来自个体的日常生活用语,因此,往往具有很强的描述性,也很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第三,文化特异性,即不同文化、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人格结构上可能会存在显著的差异。

按照词汇学的假设,人格结构的跨文化差异不外乎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不同语言(文化)中描述人格特点的形容词(人格特点)不同,另一种可能性则是由于人格特质形容词(人格特质)进行了

参见杨国枢、王登峰《中国人的人格维度》,载《第三届华人心理学大会论文集》,北京,1999。

不同的组合。不同语言中的形容词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如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在数量上远远少于英文中的形容词^[9],而且大多数东方语言(如日语、韩语、菲律宾语)和印欧语言(如德语、荷兰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匈牙利语)中的人格特质形容词数量都低于英语^[10]。然而,即使人格特质形容词的数量不同,但大多数的形容词是可以进行语言间的互译的,而且其含义的差别也远远小于人格结构的差异。因此,人格结构的跨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应该来源于对行为(人格)特点进行归类的差异。

三、人格结构的行为归类假设与跨文化差异

按照词汇学假设进行的人格结构的探索主要采用的是因素分析的方法,而因素分析所依据的是个体对行为(用人格特质形容词或句子描述)评估的内部一致性,即把评估倾向相近的项目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潜因素(或人格维度)。因此,如果同一行为在不同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含义,或人们对行为间联系的期望或思维方式不同,就会把这一行为归类到不同的人格维度中去。

图 2 是对人格结构的行为归类假设的直观表达,即(1)行为出现的频率受到文化的直接影响,而对行为的描述和评价过程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不同的行为范畴(即某一行为范畴中的行为类别不同,行为范畴本身也不同),并最终形成不同的人格结构。(2)哪些行为范畴组合成一个稳定的人格维度也受到文化因素的直接影响,即人格结构的跨文化差异不仅表现为人格维度数目的不同,而且维度的内涵也会有所差别^{[17][18][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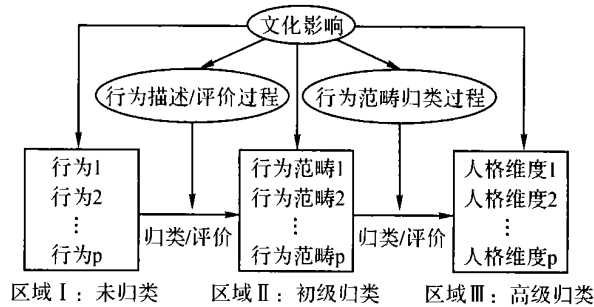


图 2 文化与人格结构的关系示意图

西方的“大五”人格结构反映的是行为或人格特征的五个相互独立的方面,符合行为归类假设。而且,西方人格的这五个维度或行为范畴中所涉及的行为很少重合,都是相互独立的,任何一个维度都有着完整的意义。例如,神经质维度是单独的反映个体情绪稳定性特点的,在其他维度中基本上不包括与此有关的内容,惟一的例外就是外向性维度中包括“积极情绪”层面,但也是从外在表现进行描述的。

相比之下,中国人的人格维度在结构上则更复杂一些,而且从行为的表面意义来看,似乎并不符合行为归类假设。外向性反映的是人际交往情景下主动、积极、活跃、自然的特点;善良反映的也是人际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诚信、正直的内在品质和对他人的基本态度;行事风格反映的是在工作中体现出的稳定的个人特点;才干反映的是个体的工作能力和态度;情绪性是反映做事和人际关系

参见王登峰、崔红《中西方人格结构差异的文化意义》,收录于我国台湾地区主办的“第七届华人心理与行为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报告”,2004年10月24—26日,台北。

情境下个体情绪反应特点的维度;人际关系反映的是人际交往中温和友好、热情主动的特点;处世态度反映的是个体对人生和事业的基本态度。因此,中国人人格结构的七因素模型中,反映个人特点的维度有两个(才干和处世态度),反映人际关系特点的维度有四个(外向性、善良、情绪性和人际关系),反映事物指向特点的维度有一个(行事风格)。同时,情绪性、才干和处世态度维度也反映了个体事物指向的特点。虽然中国人人格的这七个维度反映的行为特点带有一定的描述性,但主要属于评价性的,而不是对现象的客观陈述。无论是内在特点(如善良、才干和处世态度)还是外在表现(如外向性、行事风格和情绪性),每一个人格维度除对所涉及的行为进行归类以外,还带有明显的评价和社会判断,行为本身的含义反而并不那么重要。

另外,每一个维度的意义相对完整,但并不全面。例如,虽然对人格维度的命名中包括“情绪性”维度,但其内容并没有包含情绪稳定性的所有内涵,而只是反映个体在人际交往和行事方式上的情绪性特点。西方的神经质维度中所包含的内容则分别被归类到中国人人格的六个维度中去。

尽管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存在明显的行为类别的重合,但对 QZPS 的 18 个小因素进行二阶因素分析却得到了三个维度,而且这三个综合性人格维度体现了明显的行为类别特点,即自我指向、他人指向以及事物指向的行为特点^[20]。自我指向特点包括人格结构中外向性、行事风格、才干、人际关系和处世态度等五个维度的内容。这五个维度不仅反映了个体的个人特点,还包括人际关系和处理相关事务的特点,但这五个维度中凡主要涉及个人指向特点的内容都集中在了自我指向维度中,因此,是一个综合性的“自我”维度。他人指向(涉及外向、善良、才干和人际关系等四个人格维度)和事物指向(涉及外向、行事风格、才干和情绪性等四个人格维度)也有同样的性质,它们是汇集了几个人格维度中与他人和事物有关的特点。因此,中国人人格的这三个“超级因素”体现了行为归类的趋势,但是在更加抽象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对行为的描述和评价的程度差异。同时,西方的人格结构比较单纯,内容划分清晰,而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则比较复杂,每一个维度有着独立的意义,但仅仅涉及某一方面内容(如人际关系特点)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按照人格结构的行为归类假设,如果西方的人格量表项目能够构成中国人所有人格特点的“无偏样本”,那么,它们也应反映中国人人格的七因素结构,而不是其原始结构,这一推论已经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中国被试对西方的大五人格量表 NEO PI-R 项目的反应,在进行因素分析时得到了七个因素^[18],对美国和意大利大学生在 NEO PI-R 上的反应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即美国大学生的反应可以用五个维度解释,而意大利大学生的反应则是三个维度的解释最佳^[21]。这些结果不仅支持了人格结构的行为归类假设,而且进一步表明了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差异主要是对行为归类的差别所致。而这种行为归类的差异则源于中西方文化的深层差异。

四、中国人人格结构的文化意义

人们对自身或他人行为和内心体验的描述是探索人格结构的依据,因此,中国人和西方人在人格结构上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对自身或他人行为和内心体验的描述策略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在对行为或现象的内在规律的认识上,中国人往往会把重点放在行为或现象间、以及行为或现象与自己的“联系”上,因此,客观的描述中会带有明显的主观评价色彩,或“评价”与“描述”混合在一起,以评价为主。而西方人则把重点放在行为或现象的本身特点上,主要是客观描述并分析行为或现象的内在特点。当面对自己或他人的某一行为表现或内心体验时,西方人把重点放在对象的特点和内在规律上,是比较客观的认识和评价过程,因此,其反应主要是由情境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而中国人则除了关注对象本身的特点和内在规律以外,还会关注对象与自己、与其他情境或人物的关系,

因此,其反应除受情境本身的特点和内在规律的影响以外,还受到个体对该对象评价的影响。

中西方人格特质形容词和人格量表项目的属性为我们了解文化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Allport^[7]对英语中人格特质形容词的整理中发现,描述性和评价性的人格特质形容词共9767个,描述性和评价性的形容词分别占46.5%和53.5%,描述性和评价性形容词的数量大致相当;而王登峰等^[9]对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的整理则发现,描述性和评价性的人格特质形容词共4020个,描述性和评价性的形容词分别占38.4%和61.6%,评价性形容词几乎是描述性形容词数量的两倍。同时,NEO PI-R的240个项目中,描述性和评价性项目分别占65%和35%,描述性的项目几乎是评价性项目的两倍;而QZPS的180个项目中,描述性和评价性项目分别占31%和69%,描述性项目不足评价性项目的一半^[18]。这一结果表明,中国人在“描述”自己或他人的人格特点时所依据的是“评价过的特点”,或综合性的特点,而不是单独的某一特点。西方人则正好相反。

中西方文化对评价的看重程度差异可能是中西方人格结构差异的原因,而且对评价的看重程度差异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按照黎鸣^[22]的观点,文化是对人类自罪意识的掩饰,是人性的外衣。按照这种观点,文化的根本差异皆源于对人性的不同看法,而中西方文化中对人性的看法恰恰是截然相反的:中国文化中“人性本善”一直占据上风,而西方文化中则一直是“人性本恶”占据上风。因此,如果西方人在言行中表露出“恶”的一面,由于人性本恶,他们的防御也会比较少;而如果中国人在言行中表露出“恶”的一面,由于人性本善,他们必须说明自己的这个“恶”并非自己的本意,这样才能维持自尊和良好的社会适应,因此对行为的防御会更强烈。

耐人回味的是中西方“文化”一词的词源也有明显差异:“汉语中‘文化’本含有‘文饰化裁’之意。在古文字中,文通纹,化通花、华,全都有在表面进行修饰、美化的意思^[21]。英语的‘文化’(culture)一词的词根源自耕作、栽培、培养、教养。从植物的栽培到人的教养,这后一层也隐隐含有为人性披上‘有教养’外衣的意思。”^[215]

从“文饰化裁”到“栽培教养”,凸显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信奉“人性本善”的中国文化中,文化的作用就是对行为的“矫饰”,以“遮掩”行为的真实面目,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言行更接近人性,即“善”或“完美”。人的自私、贪欲、无礼都是不符合人性的,个体把对自己言行进行调控的重点放在不表现出“恶”上,因此需要进行“文饰”。而“文饰”的目标是使自己的言行与人性(善)更接近,因此,实际的言行之上都已经增加了一层“文饰”,变得面目不清了。即使言行中并未表现出“恶”,也会在自己的言行之上增加文饰以彰显人性的“光芒”。例如,无论面对成功或失败的情境,中国人都倾向于为自己辩解,失败时辩解的目标是使自己的行为“看上去没那么糟”,而成功时辩解的形式是自己的行为“没那么好”,目的是使自己“不表现”骄傲,以及一旦表现不好,也可以更方便地进行辩解^[23]。

而在信奉“人性本恶”的文化中,文化的作用就是对行为的“培养和栽培”,以“改变”当前行为的水平或层次,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言行“远离”人性中的“恶”,以达到“善”或“完美”。因此,西方人的“坦率”是因为较少防御的压力,而西方人的“张扬”则是通过彰显成绩以表明自己对“恶”的远离。西方文化虽然也带有明显的“文饰”倾向,但采取的是“改变”而不是“遮掩”。人的自私、贪欲、无礼尽管也需要进行“文饰”,但至少会承认其“合理性”,因此,对其的防御和文饰压力会小很多,重点不是“不表现”,而是“教养”和“栽培”。西方人只有在面对失败情境时才会为自己辩解,面对成功的情境时则无需辩解,反而会更加强化自己的成功(以远离人性中的“恶”)^[24]。

中国文化的“文饰化裁”特点会影响到个体对自己言行的控制以及对他人言行的认识。首先,中国人在表现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之前虽然要对其“个人效果”进行评估,但更需要对自己言行的“社会效果”进行评估。在很多情况下,即使非常希望表达某种意愿或做出某种行为以达成自己的内心需要,但由于直接表达可能会违背社会规范或他人的期望,或可能造成他人的消极看法,只好

作罢或以“转换”、“曲折”、“间接”的方式表达。在中国文化中,直接、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要求和看法往往被看作是幼稚和不成熟的表现。

其次,个体在认识到需要对自己的言行进行修饰,不能直接表达的同时,对他人言行的认识也会采取相同的策略:不仅看人的表现(所言、公共场合的所行),还要探究其真实的意愿和用意。中国文化中一直渲染的“知人”难,难就难在“知”的过程不仅需要了解其言行,还需要“深入”其内心世界,而且后者是“知人”的关键。换言之,中国文化中的“言为心声”其实只是“矫饰”而已,因为就连“行”都不一定是对“心声”的反映,更何况“言”呢?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的“深”,可能就是“深入”、“深层”的意思罢了!

与中国人自我表达和判断他人的“曲折化”相比,西方人则更直接、更坦率。中国人注重评价和联系,因为根据眼前可观察的信息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西方人注重可观察的信息,是因为他们更相信“言(行)为心声”。换言之,在内心愿望与外在言行的一致性程度上,中国人应该显著低于西方人。

五、中国人的入格、行为及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仅是造成人格结构差异的原因,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到人格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一方面非常重视个体的内心体验和动机,而不太重视外在的行为表现;但同时又对行为规范设置了众多成文的、特别是不成文的规矩,由此,就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外在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而对内心的真实想法和动机则有所忽视。这样一种对个体内在和外在特点的相互矛盾的要求,是研究中国人人格时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了反复的包装和修饰之后,中国人的言行往往只是反映了个体对环境要求的回应,而很少能够体现个体的内心体验和内在动机。在儒家典籍中,对上文提到的“个人化的行为”也提出了与“情境化的行为”相似的要求,即所谓“君子慎独”。因此,在中国文化中,个人化和情境化行为的区分是不明显的,几乎所有的行为都带有情境化行为的特点。

经过中国文化的浸润,个体一方面会努力约束自己的言行以符合社会的要求,甚至在违背自己内心意愿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又会推己及人,认为他人的言行可能是故意做出来的,并不能反映他们内心的真实需要和要求。在中国文化里,“适应”的含义是双重的,包括“行”和“知”两部分。“行”即自己的言行要符合社会的要求(不一定反映自己的内心需要),“知”即明白和了解这样的事实:他人的言行与他们的内心体验和要求基本上是无关系的(正如自己的言行不一定反映自己的真实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人格结构中行为与内心体验的一致性只有在不违背环境要求的前提下才可能出现。即在某些情况下,个体表现出行为与内心体验和动机的一致性,如在完全由自己决定行为的时候,或在亲友面前时,个体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随意表现不仅是对自我的放松和解脱,也是对亲友的尊重和关系密切的表现。可以想像的是,如果个体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要么他是不能正视自己,要么是亲密关系出现了问题,都是个体不适应的表现(个人化行为)。但在其他的情况下,个体表现的行为首先需要符合环境的要求,能否与内心体验和动机一致反而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这时只有符合环境要求的行为(而不一定与个体的内心体验和动机一致,甚至相反)才是适应的。这时如果个体仍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那反而是不适应的了(情境化行为)。

相对而言,西方文化中虽然照样存在“个人化行为”与“情境化行为”的区分,但对于行为与内心体验和动机的一致性却不存在相互矛盾的要求。简单地说,在中国文化中,对“情境化行为”的要求是首先满足环境的要求,在此基础上照顾个人的要求;而在西方文化中这种关系可能是颠倒的,即

首先考虑个人的要求,并参照环境的要求加以调整。中西方文化对行为的不同影响已经有大量的文献支持,如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分别界定为集体主义(以看重社会及人际和谐为标志)和个人主义(以看重个人利益为标志)文化的观点已经被大多数跨文化心理学家所接受^{[25][26][27]}。

行为的跨情境不一致与心理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在对责备倾向的研究中,西方研究的结果表明,当自己与他人对某一负性事件共同负责时,心理控制源^[28]的内控者往往较多责备自己,较少责备他人,而外控者则相反,较多责备他人,较少责备自己,而不管自己与另一位责任者的关系如何^{[24][29][30]}。这表明,无论是否存在环境压力或环境压力的大小(与他人的关系反映了环境压力的大小,与有亲密关系的他人共同承担责任时,责备他人的压力比较小),西方人的行为倾向是比较一致的。然而,在中国被试中的责备倾向却出现了明显的不一致。当自己与另一个责任者是同事关系时,与西方的研究结果一致,内控者较多责备自己,较少责备他人,而外控者则相反,较多责备他人,较少责备自己。但当另一个责任者与自己是夫妻关系时,责备倾向出现反转,即内控者较多责备他人,较少责备自己,而外控者则相反,较多责备自己,较少责备他人^{[23][31]}。两个责任者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个体行为(责备)承受的环境压力的大小,中国人在两种情况下责备倾向的反转说明了环境压力对中国人行为影响的重要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人而言,这种行为的跨情境不一致性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或必然要求。例如,在神经症病人的责备倾向中不存在上述的不一致性,而是表现为稳定的过多责备自己或他人的倾向^[32]。

通过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人格无论是概念内涵还是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都存在显著的中西方差异,并且都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着密切的联系,值得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黄希庭.再谈人格研究的中国化[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0(6):5-9.
- [2] 陈仲庚,张雨新.人格心理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 [3] FUNDER D. The Personality Puzzle[M]. New York: Norton, 1997.
- [4] ALLPORT G W. Personality: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M]. New York: Holt, 1937.
- [5] PERVIN L A. The Science of personality[M]. New York: Wiley, 1996.
- [6] 王登峰,崔红.解读中国人的人格[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7] ALLPORT G W, ODBERT H S. Trait names: A psychorlexical Study[J].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1936, 41 (1): 1 - 36.
- [8] JOHN O P, ANGLEITNER A, OSTENDORF F. The lexical approach to personality: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rait taxonomic research[J].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88, (2): 171 - 203.
- [9] 王登峰,方林,左衍涛.中国人人格的词汇研究[J].心理学报,1995,27(4):420 - 427.
- [10] JOHN O P. The "big five" factor taxonomy: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in the natural language and in questionnaires[A]. PERVIN L A.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C].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0
- [11] MCCRAER R, COSTA P T. Personality trait structure as a human universal[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7, 52(5): 509 - 516.
- [12] 崔红,王登峰.中国人人格结构的确认与形容词评定结果[J].心理与行为研究,2003,1(2):89 - 95.
- [13] 王登峰,崔红.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的编制过程与初步结果[J].心理学报,2003,35(1):127 - 136.
- [14] DI BLAS L, FORAI M. An alternative taxonomic study of personality descriptive adjectives in the Italian language[J].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98, 12(2): 75 - 101.
- [15] CHURCH A, KATIGBAK M S, REYES J A S. Toward a taxonomy of trait adjectives in Filipino: Comparing personality lexicons across cultures[J].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96, 10(1): 3 - 24.
- [16] CHURCH A T, KATIGBAK M S. Trait psychology in the Philippines[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0, 44(1): 73 - 94.

- [17] 王登峰,崔红. 中国人“大七”人格结构的理论分析[A]. 王登峰,侯玉波. 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论丛:一[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18] WANG D, CUI H, ZHOU F. Measuring the personality of Chinese: QZPS versus NEO PI-R[J].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5, 8(1): 97 - 122.
- [19] WANG D, CUI H. Chinese personality: Structure and measurement[A]. JING Q C, ROSENZWEIG M R, D'YDEWALLE G, et al. Proceedings of ICP 2004[C].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2005.
- [20] 王登峰,崔红. 中国人人格量表的信度与效度[J]. *心理学报*, 2004, 36(3): 347 - 358.
- [21] CAPRARA G V, BARBARANELLI C, BERMUDEZ J, et al. Multivariate methods for the comparison of factor structure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 illustration with the big five questionnaire[J].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2000, 31(4): 437 - 464.
- [22] 黎鸣.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21世纪中国人应当怎样变得聪明起来[M].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03.
- [23] 王登峰. 责备与辩解的心理控制源影响:进一步的证据[J]. *心理学报*, 1992, 24(2): 314 - 321.
- [24] BASGAL J A, SNYDER C R. Excuses in waiting: 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and reactions to success/failure feedback[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8, 54: 656 - 662.
- [25]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M].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0.
- [26] KIRKPATRICK J, WHITE G M. Exploring ethnopsychologies[A]. WHITE G M, KIRKPATRICK J. *Person, Self, and Experience: Exploring Pacific Ethnopsychologies*[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27] TRIANDIS H C.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 [28] ROTTER J B.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J].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1966, 80: 1 - 28.
- [29] BULMAN R J, WORTMAN C B. Attributions of blame and coping in real world: Severe accident victims react to their lost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7, 35: 351 - 363.
- [30] WANG D, ANDERSON N H. Blaming and excuse-making as a function of 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4, 24(2): 27 - 36.
- [31] 王登峰. 心理控制源倾向及人际关系情境对责备特点的影响[J]. *社会心理研究*, 1992, 4: 20 - 25.
- [32] 王登峰. 人际关系情境下神经症病人的责备倾向特点[J]. *应用心理学*, 1992, 7(1): 41 - 48.

[责任编辑 江予新]

Behavior Classification Hypothesis on Personality Structure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Personality

WANG Deng-feng¹, CUI Hong²

(1. *Institute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Medical Psychology Division, General Hospital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Beijing 10085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imed at exploring the contents, Chinese-Western differences of personality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 Western personality psychologist, such as Allport, Pervin, and Funder proposed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personality, with only similarities of viewing personality as both internal and unobservable characteristics and external and observable behavioral patterns, as the Latin origin of persona.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and current everyday behaviors reflected the same classification of personality as internal-external aspects of personality. According to both the Western and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personality,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personality be composed of four facets, namely, behavior, inner experiences, motivation, and neuro-physiological responses, which are all influenced by culture to different degrees.

Lexical hypothesis of personality research reveals that five or seven dimensions are the best descriptor of Western and Chinese personality structure. The cross-cultural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both the number and the contents of personality dimensions are related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hinking and evaluating styles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individuals. Chinese are prone to combine different clues in the background to evaluate each of the behaviors, while Westerners tend to lay emphasis on the behavior per se. Different meanings assigned to behavior are proposed as the reason of personality structur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cultures.

Accordingly, behaviors aimed at adjust to the situation would be influenced more by situational factors and less by personality factors, such as being warm-hearted towards colleagues and supervisors. The more detailed situational requirements exist in culture, the more frequently individuals exhibit such kind of behaviors. However, even individuals who exhibit different behavioral pattern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say, inconsistency across situations, the intention or motivation of these behaviors, as part of personality, exhibit consistency across different situations. This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the four-folded/facet personality concept. Meanwhile, behaviors aimed at containing the integration of personal values and interests would be influenced more by personality factors and less by situational factors, such as leisure time activities and unobservable habits and intimate relations.

The paper also addresses 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rsonality, behavior, and adjustment to situations, and further research directions. As many cross-cultural psychologists point out, individual behaviors, described as Collectivism in Chinese culture, would be influenced more by situational factors, compared with those described as Individualism in Western cultures. Empirical evidences support the claim that in Chinese culture it is the indicator of mental health to be able to adjust to situational requirements, while it is the indicator of mental maladjustment to be unable to. For a Westerner, however, it is found that the cross-situational consistency of behaviors is the good indicator of mental health.

Also discussed in the paper are implications of personality definitions and classifications of different behavior types in the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personality.

Key words : personality ; motivation ; behavior classification hypothesis ; adjustment

本刊讯 2005年10月25日至26日,由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所、浙江省档案学会、墨西哥西那鲁阿州、墨西哥州政府行政与文件服务处联合举办的数字档案馆国际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墨西哥西那鲁阿州政府行政发展副秘书长塞萨尔·米盖尔·瓦伦苏埃拉·埃斯比诺萨(Cesar Miguel Valenzuela Espinasa)先生和墨西哥州政府行政与文件服务处处长罗道尔·阿拉尼斯·博依索(Rodolfo Alanis Boyzo)、档案处处长卡尔多·马德里·佩雷斯(Ricardo Madrid Perez)等人出席本次研讨会并作了发言。何嘉荪教授、张照余教授等学者以及深圳档案局李国庆研究员作了主题报告。此次研讨会就数字档案馆建设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各地学者相互分享不同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和经验,并就学术界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最后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使本次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